

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的探究路径及其意义^①

The Way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an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Study on the Women of Kong Family

姜丽静 (Jiang Lijing)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Faculty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内容提要：在一定意义上，孔氏家族女性是中国古代儒家妇德规范的标识和楷模。透过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教育状况和内心世界，反思其与主流儒家妇德规范和性别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为我们重新审视某些“既定”的“主流”和“正统”女子教育观念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儒学研究、中国妇女史和孔子后裔研究进展与趋势的梳理，对孔氏家族女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阐发，在借鉴已有研究经验，同时规避其不足的基础上，形成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研究的独特取径：其一，从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再反思”出发；其二，从“妇女”到“性别”，即从单纯关注妇女问题的妇女史转向更为开阔的性别研究；其三，从“个体”到“家族”，即将个人生活史和家族叙事相结合，在家族、互系的伦理脉络中观照个人；其四，从“文献”到“物质”，即顺应国际历史学和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物质文化史转向，承续国内教育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整体态势，综合运用文献和物质等多形态史料，积极开展关涉孔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孔子直系女性后裔德育生活史研究”（课题编号20BA160075）的阶段性成果。

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关键词：孔氏家族女性；大众儒学 “五四” 妇女史观；教育生活史；物质文化史

Abstract: In a certain sense , the women of Kong family are the symbol and model of Confucian norms on women's virtues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daily life , educational situation and inner world of this special female group , we can reflect on its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dominant Confucian norms of women's morality and gender order , which provides us an excellent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 some "established" "dominant" and "orthodox" female education concepts.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onfucianism ,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 and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 also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the academic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women of Kong family ,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is then outlined as follows. Firstly , rethinking the "reflection" of the "May Fourth" construction of the victimized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Secondly , shifting our focus primarily on "women" to a broader view of "gender" , namely including females and males ,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issues. Thirdly , shifting our focus primarily on "individual" to "family" , interpreting personal deed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and society , by combining personal life history with family narrative method. Fourthly , shifting our focus primarily on "literature" to "material" , exploring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women of Kong family by us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material culture , etc. , following the material turn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women's history , as well a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the women of Kong family ; mass Confucianism; “May Fourth” construction of the victimized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孔氏家族系指以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为一世祖，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子孙繁衍而逐渐形成的大家族。孔氏家族女性，主要指涉孔子直系子孙的“妻”与“女”。自汉代开始，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孔子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和加封，孔子后裔亦屡受封赠。从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获赐“关内侯”、食邑八百户以祀孔子开始，孔子后裔获得封爵和相应赏赐延续近两千年。^①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获封“衍圣公”（赵汝愚，1999）⁹⁸⁵。其后，历经元、明、清和民国，至1935年方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②。这一封号和爵位延绵八百余年，虽屡经朝代更迭，孔子后裔却能世享荣爵，成就孔氏家族在中国古代

① 《汉书》载“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参见：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551。这是目前可考的孔子后裔奉祀孔子的第一个封号。然而实际上，这一封号最初并不是为奉祀孔子而封赐的，而是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因仕获得的封号。孔霸，字次儒，承家学，主修《尚书》，师事太傅夏侯胜。汉昭帝末年被任命为博士，宣帝时任大中大夫，为皇太子讲授经书。皇太子即位后（即汉元帝），由高密相征为师。初元元年，孔霸获赐官给事中，封号褒成君，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黄金二百斤，并将其户籍迁往长安。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爵位共分十二级，最高一级为彻侯，第二级为关内侯。孔霸为人谦逊，常说自己爵位太高，功劳不足承当。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元帝曾想任命其为御史大夫，但他三次上书坚辞不受，并上书请求奉祀孔子。汉元帝当即下诏同意。参见：班固·汉书[M] // 上海书店：二十五史：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76。孔霸去世后，其子孙孔福、孔房和孔莽等相继袭封褒成君封号。

② 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将孔德成先生的“衍圣公”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给予特任官待遇。1935年7月，孔德成先生偕复圣奉祀官颜世镛、宗圣奉祀官曾繁山、亚圣奉祀官孟庆棠前往南京，参加宣誓就职典礼。由此，传承880年的“衍圣公”爵位正式终结，孔德成先生成为最后一代“衍圣公”、第一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详见1934年11月16日《申报》关于中央常务会议的报道和孔子博物馆藏1935年《国民政府特给凭证》。

(C)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天下第一家”的传奇。

孔子后裔，作为孔子身后荣爵的直接承袭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孔子和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独特象征，不仅享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也担负着奉祀先祖、垂范世人等职责。与之相应，孔氏家族女性，作为孔子的女性后裔，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儒家妇德规范的标识和楷模。因此，透过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教育状况和内心世界，反思其时占据主流的儒家妇德规范和性别秩序，审视两者之间的融通权变抑或矛盾冲突，是一个绝佳的研究视角。此外，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和当代中国文化转向的特殊语境中，借助孔氏家族女性这一特殊群体，重新审视“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女性生活和教育的诸多既定观点，还原中国古代女性生活和教育的更多历史侧面，将有望间接澄清人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乃至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诸多误解，这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在此，本文将从孔氏家族女性相关研究进展、孔氏家族女性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以及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可能取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孔氏家族女性研究的荒芜

孔氏家族女性研究，就其研究范围而言，属于儒学、中国妇女史和孔子后裔研究等多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交叉课题，因此下文从这三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入手梳理和盘点相关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一）主流儒学研究：对生活与性别的遮蔽

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激进反传统进路的影响，国内儒学研究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特点，对于孔子地位和儒学价值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全盘否定到重新认识，并阐释其现代价值抑或独特意义的曲折历程（杜维明，2014）¹⁸⁻²⁹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儒学研究主要有两脉,一脉由中国学者努力赓续,另一脉则经由国外汉学学者的研究得到发展。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迄今,在西方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兴起的背景下,以美国“波士顿儒学”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开始与梁漱溟、牟宗三和熊十力等人所开创的现代新儒学达成某种程度的“契合”,强调儒学的“宗教”性质,即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精神传统,甚至是宗教传统。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芬格莱特(H. Fingaratte)的《孔子:神圣的凡夫》(*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1972)、秦家懿(J. Ching)的《儒学与基督教:一个比较研究》(*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1977)、南乐山(R. C. Neville)的《道与魔》(*Tao and Daimon*, 1982)、杜维明(W. Tu)的《论中庸》(*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1976)、泰勒(R. Taylor)的《儒家思想的宗教向度》(*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1990)和白诗朗(J. H. Berthrong)的《普天之下》(*All Under Heaven*, 1994)等。尽管对于儒学是否属于宗教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宗教性或超越性,不少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但是,总体而言,将儒学理解为一种在过去和现在依然支配着人们日常言行的价值信仰系统抑或精神传统,愈益成为国内外儒学研究的广泛共识。

此外,关于儒学的类型和层次问题,国内外儒学研究也进行了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杜维明从儒学发展历史和区域空间传播的视角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三期或三种形态^①,并对

① 杜维明认为:儒学发展的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或曲阜地方知识逐步发展成为中原文明的主体,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儒学发展的第二期主要是宋明儒学的发展,在公元 11 世纪以后的一千年内,儒学从中原文化发展成为东亚文明,其影响波及朝鲜、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是指自近代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以来,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启蒙心态”做出创见性的回应,并在内部获得进一步发展或转化,进而实现儒学从东亚文化向世界文化的发展。参见:杜维明.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30-37; 杜维明.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儒学层次进行了三维划分——“作为精英思想的儒学”、“在民间所传播的儒学”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儒学（杜维明，2014）⁸。成中英（C. Cheng）基于世界范围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从信仰和知识两个维度剖析了儒学的两个面相，并将儒学划分为信仰儒学和知识儒学两个层面（成中英，2017）³³³⁻³⁴⁰。李泽厚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两维区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借用于对儒学做两维划分（李泽厚，2008）。中国大陆的许多儒学研究者经过一段时期的热议，将儒学分为心性儒学、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民间儒学、情感儒学和生活儒学或社会儒学等不同层次和类型（蒋庆，1991；蒋庆，2015；何光顺，2019；郭齐勇，1994；颜炳罡，2006；蒙培元，2009；陈来等，2018；黄玉顺，2006；谢晓东，2010）。也有学者针对新儒学发展的势态，将其划分为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三种形态或存在方式（陈来，2013a）。台湾新儒家将儒学划分为精神性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和大众或民间化的儒学三个层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G. Rozman）教授则认为，存在五种不同形态的儒学，依次是：皇权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改良儒学（reform Confucianism）、知识分子儒学（intellectual Confucianism）、商人儒学（merchant-house Confucianism）和大众儒学（mass Confucianism）（Rozman，1991）。

目前，尽管对于儒学的具体层次和称谓等问题尚存在分歧，但是学界比较倾向于认为，至少存在精英儒学（知识分子儒学）、官方儒学（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和大众儒学（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三种形态的儒学。总体而言，注重精英儒学和官方儒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少数男性精英儒家学者思想的研究，是国内外主流儒学研究的一贯理路。相对而言，学界对底层社会、普通大众和女性的儒学理念和儒学实践等问题则关注不足。如果将儒学视为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价值信仰系统的话，相关研究似乎不应该单纯局限于精英儒学或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也似乎不宜仅仅执着于制度（政治）儒学的再建构。毕竟随着制度儒学及其所依附的社会体制在清末的崩

解，如果说儒学确已全面退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抑或在近代“花果飘零”之后，仅赖少数精英儒学学者“存亡续绝”的文化心灵和持续努力而得以延续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又与其有何关联？如果作为价值信仰系统的“儒学”确如有学者所言是东亚社会和中国当前崛起的精神资源与内在动力的话，那么这种“儒学”似乎更应该从“大众儒学”，即普通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和日常行为中寻绎。

事实也确乎如此，越来越多的儒学学者尤其是中国大陆儒学学者开始重视大众儒学或民间儒学。他们强调，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不仅是经典的解说，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今天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陈来，2013b；颜炳罡，2006；郭齐勇，1994）。遗憾的是，尽管部分研究者已开始积极投身于民间儒学和乡村儒学的实践推动，但是，总体而言，相较于精英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再度勃兴，大众儒学或者说民间儒学依然处于主流儒学研究的边缘。此外，性别分殊和内外空间的界化亦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儒学世界中的性别与女性以及女性和性别儒学等问题被主流儒学研究遮蔽了。

（二）中国妇女史研究：对家族与男性的忽视

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初，在“五四”时期达到研究高峰。但是，由于特定时期“反传统”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中国妇女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之中，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代表了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并且，在其时“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认为，导致中国古代妇女“悲惨”地位

的根源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衍生的礼教制度。^① 尽管这一“五四”妇女史观并非完全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之上，但其影响十分深远。20 世纪 40 年代后，这一“五四”时期“悲惨”的传统女性形象被不断强化，构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并一直支配着自新中国成立迄今的中国妇女史研究。^②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的中国妇女史学者开始深入反思“五四”妇女史观，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Ebrey, 1993; Ko, 1994; Mann, 1997; Bray, 1997)。这些研究大多从反思“五四”妇女史观出发，不仅“发现”大量才女群体存在

① 反清革命家徐天啸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妇女通史《神州女子新史》中，为激励中国女性成为有价值的新公民，将从维多利亚女王到罗兰夫人等在内的众多杰出的西方女英雄作为例证。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尽丧，依赖性强，奈何奈何。”（徐天啸，1913）² 这一时期，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逐渐成为大多数国人心中“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似乎所有受害妇女的特征都可以在祥林嫂身上找到，她被以其丈夫的名字相称，她被像商品一样卖掉，没有独立人格，最可悲的是，她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所操控，从来不知道反抗，总是责怪自己的命不好（鲁迅，1983）¹³²⁻¹⁵⁰。此外，这一受害妇女的文学形象被历史研究所强化。如陈东原在其时影响最大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指示出来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怎样的施演，女性之摧残是怎样的增甚，还压在现在女性之脊背上的是怎样的历史遗蜕！”他进一步指出“我现在燃着明犀，照在这一块大石上，请大家看明白这三千年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个妖魔古怪，然后便知道新生活的趋向了！”（陈东原，1937）¹⁸⁻²⁰ 追究妇女（包括其他人）“受害”或“悲惨”地位的根源，“吃人的礼教”（鲁迅《狂人日记》首先揭示，其后经过吴虞《吃人与礼教》的进一步阐发而广为流传）是罪魁祸首。在其时“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反传统浪潮中，孔子作为礼教的“始作俑者”，对于妇女的“受害”和“悲惨”地位，自然难辞其咎。

② 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先驱高彦颐（D. Ko）指出，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对 20 世纪以前中国女性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鲁迅和陈东原等作家勾勒的关注点、价值和专有词汇中（Ko, 1994）^{introduction 1-3}。例如，国内中国妇女史研究先驱杜芳琴在 1988 年出版的著作《女性观念的衍变》中，几乎逐字重复着“五四”时期的观点“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束缚妇女身心的四条绳索，将中国妇女牢牢束缚，直至今日仍阴魂不散。”（杜

芳琴，1988）³⁷⁸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于中国古代社会，也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依然存在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及其发展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中国传统女性都是“祥林嫂”似的“受害者”的结论（Ko，1994；王政，1997）。其后，国外的中国妇女史学者大多沿着相近思路，开始对不同时段、地域、阶层和家族的女性进行类型化、具体化的个案研究，努力修正“五四”时期的“受害”女性形象。^①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广泛借鉴了性别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料运用上，随着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再版，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十分重视对诗词、传记、地方志、戏曲和小说等文学性的“非官方”文献的收集和分析（罗晓翔等，2015；贺萧等，2008）。

进入 21 世纪，随着西方历史学研究从注重文献研究向重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范式转型，西方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围也开始从女性的文学特长转向“女红”或“女工”等工艺领域，触及刺绣、服饰、绘画、工具制作、科技和医药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领域的跨学科性质客观上要求研究者摆脱以往单纯倚重文献分析的研究范式，广泛借鉴艺术史、科技史、医药史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表现出向物质文化史转向的明显努力（Ko，2005；Tunstall，2012；Huang，2012；Li，2012；Ko，2017；Blanchard，2018）。

① 高彦颐在其代表作《闺塾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研究思路，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策略，即“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妇女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最重要的是，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Ko，1994）^{introduction 4}。这为此后的国外中国妇女史研究指出了方向和方法。需要补充的是，2015 年 2 月，当笔者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学术年会时，在笔者参加的性别问题分组研讨中，主持人和参与研讨的多位学者仍然不断强调高彦颐在 1994 年提出的这一研究原则，即“对特定的时段和个别地区”，以及“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并将其视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可见，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研究思路及研究策略仍然影响着国外的中国妇女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多数学者依然受到“五四”妇女史观的影响,并且较多采用通史或断代史的写作模式,试图对中国妇女史或女子教育史进行整体、全面的梳理,以期把握中国妇女(教育)历史的全貌和整体演变趋势。部分学者则致力于中国妇女史和性别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将相关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理论介绍和实践推动(杜芳琴等,2003;李小江等,2002)。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的出版,曼素恩(S. Mann)、高彦颐、伊沛霞(P. B. Ebrey)、贺萧(G. B. Hershatter)和白馥兰(F. Bray)等人的代表作品被陆续介绍到国内(曼素恩,2005;高彦颐,2005;伊沛霞,2004;贺萧,2003;白馥兰,2006),促进了国内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尽管近年来国内中国妇女史研究发展得很快,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跟进或对接国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但是,总体而言,国内中国妇女史研究仍然处于借鉴国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阶段,其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女作家或女诗人,史料形态以文献资料为主,在研究思路上则侧重反思“五四”妇女史观,注重发掘中国古代才女群体的史料。

(三) 孔子后裔研究: 对女性与教育的淡忘

与儒学研究和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相对繁盛相比,关于孔子后裔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孔子后裔的相关史料曾经历过相对封闭的保存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目前,由于史料的诸多限制,国外的研究还十分罕见。就国内研究而言,从地域分布来看,有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山东曲阜(孔子故乡和孔氏家族北宗世居地)和浙江衢州(孔氏家族南宗聚居地)及其周边地区。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孔府档案等文献史料的整理是关系到孔子后裔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基础性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孔府档案曾先后经历过几次大的文献整理。几批代表性成果相继被推出(曲阜县

文管会, 1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1982; 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 1988; 骆承烈 等, 2002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编纂委员会, 2018)。2013 年 12 月,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启动“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项目, 对孔府档案文献进行抢救性整理和挖掘研究, 并开展数据库建设。2016 年 8 月, 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启动了孔府档案的数字化扫描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已经完成 2421 卷 5.9 万件 37 万画幅民国档案和 940 卷 1.9 万件 5.4 万画幅清代档案的扫描工作(孔德平等, 2017)。2018 年, 由双方联合整理的《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 明代卷》正式出版, 孔府档案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与此同时, 依托孔府档案和其他史料的一些专门化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围绕孔子嫡长孙府邸——衍圣公府(即今孔府)、孔氏家族政治权力和经济问题(吴佩林等, 2019; 谢雨濛等, 2019; 李先明, 2019; 姜修宪等, 2015)、孔氏南宗(吴锡标等, 2010; 吴锡标等, 2014; 赵文坦, 2012)以及孔氏家族的学术与文学成就等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其中, 关于衍圣公府(孔府)的研究开展较早, 已出版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譬如, 孟继新的《天下第一家》(1990)主要以孔府为研究对象, 借助孔府档案、历史典故和现存建筑等, 对孔府的形成、建筑格局、田产户人、管理机构和嫡系后裔等情况进行考察, 初步勾勒出孔子嫡系后裔衍圣公的基本生活场景和日常生活状态。孔祥林、管蕾和房伟的《孔府文化研究》(2013)同样以孔府为考察对象, 利用孔府档案、历史典故和口述材料等, 对孔府的形成、孔府的社会交往以及历代皇帝对孔府的加封等进行了研究, 还专辟一章和一节分别述及衍圣公的姻亲制度及孔子女性后裔的文学成就。袁兆春的《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2013)则主要依托孔府档案史料, 从法律史角度揭示了孔氏家族的宗族法及各种法定特权, 探讨了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社

会大家族对国家政权的影响等问题。赵荣光的《〈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2007)同样基于孔府档案史料,从饮食文化这一视角展现了衍圣公府礼制完备的饮食制度和丰富多彩的宴乐生活,并初步述及衍圣公及其夫人的婚宴和寿庆宴等情况。曹兴民的《盘根错节的古树: 厥里孔氏家族文化与孔府》(2009)则结合孔府建筑群落及其空间布局,尝试解读孔府建筑这一特殊文化符号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意蕴。

此外,部分研究者借助公开刊载或对外公开的馆藏文集和诗词等文献资料对孔子后裔的学术和文学成就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在研究时段上,主要聚焦于孔氏家族文学和学术成就繁盛的清代;在研究对象上,大多以孔子男性后裔为主。其中,关于孔氏家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多以孔尚任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孔氏家族学术著述的研究,则多以学术成就卓著的孔广森等为研究个案(施婧娴, 2013)。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孔氏家族女性的研究还非常罕见。仅见的几项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对孔氏家族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董倩倩的《清代孔氏家族女性诗人诗作综考》(2010),从文献学角度对山东和浙江的北南两宗孔氏家族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发掘,初步厘清了她们的生平著述、作品版本及其存佚情况,并对孔氏家族女性作家的群体特征、地域特色、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姚金笛的《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2015)对有清一代曲阜孔氏家族的诗文创作进行了考察,尽管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孔子的男性后裔,但其中专辟一章述及孔氏家族女性的诗文创作情况。石玲的《清代曲阜孔氏圣裔女诗人论略》(2013)则以曲阜孔氏家族女性诗人孔丽贞、孔璐华、孔淑成和孔祥淑为个案,通过分析其诗词作品等文献史料,简要勾勒了孔氏家族女性诗人的生平活动、创作特色和文化成因等。其二,关于孔氏家族女性的历史考辨。如杜家骥的《乾隆之女嫁孔府及相关问题之考辨》(1992)、余志群的《否“乾隆公主嫁孔府”说》(1985)、骆承烈的《也谈“乾

隆公主嫁孔府”说》(1986)和孔勇的《“夫人”何以成“公主”?“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新辨》(2017)等均将研究集中于对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夫人于氏是否系乾隆之女的考订上。

此外,关于孔子后裔学术承续和教育情况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探讨,初步涉及孔氏家学(李学勤,1987;黄怀信等,2011;毛伟,2014)、四氏学(李观安等,1974;孟娥等,2001;汪维真,2012;刘腾等,2011)、家风(孔祥林,2015)和家族教育(张言昌等,2011),以及衍圣公府与曲阜师范(宋思伟等,2007)等方面,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的专门和系统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孔子女性后裔教育情况的研究尚待开展。

总的来说,关于孔子后裔尤其是孔子女性后裔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并且,相关研究的史料运用也十分有限。与孔子(女性)后裔存史的相对完备和史料形态的丰富相比,目前有限的孔氏家族女性研究主要局限于对已经公开出版的诗文集等文献资料的运用和研究,而同属文献史料、大量记载孔子女性后裔生活状态的孔府档案,因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所以迄今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至于书法、绘画、服饰、生活器具、建筑、碑刻和墓葬等方面的大量保存完好的孔氏家族女性文物,基本上仍然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二、孔氏家族女性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 开辟儒学、中国妇女史、中国教育史和德育研究的新课题

区别于国内外主流儒学研究较多重视精英儒学和官方儒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相对忽视大众儒学和性别儒学,从大众(生活)儒学、性别和后裔出发,通过对孔氏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教育世界和内在信仰的还原和考察,探究其与精英儒学和官方儒学所建构的外

在且宏大的道德和性别秩序之间的纠葛关系，将有望从新的角度揭开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相关的儒学研究。

此外，出于种种原因，孔氏家族女性尚未得到中国妇女史、中国教育史和德育研究等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关注，即使在关于孔子后裔的研究中，对孔氏家族女性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并且，仅见的少数研究大多由于学科限制（有限的研究者大多来自文学或历史学科），或聚焦于孔氏家族女性的文学作品，或侧重于相关女性人物史实的考辨，而从教育史视野出发，发掘孔氏家族教育或女子教育的生成境遇、运行机制、模式与特点、功能与得失等，并深入探究孔氏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和教育之间关联的研究还非常罕见。

综上所述，以国内外相关学界较少关注的孔氏家族女性为研究对象，从教育生活史的视角，揭示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教育世界和内在信仰与主流儒家道德、性别和教育理念及规制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并由此审视中国古代女子（道德）教育的生成场域、模式特点、运行机制、功能得失及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蕴，将有望弥补儒学、中国妇女史、中国教育史和德育研究等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空缺，开辟崭新的研究课题或学术领域。

（二）拓展中国教育史学的史料形态、解释空间和研究理路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比较注重学人文集、档案和史志等官方文献的运用和分析，相对而言，对于诗词、传略、日记和墓志铭等非官方文献的使用比较少见，尤其是对于绘画、书法、服饰、生活器具和建筑等方面的物质史料的运用明显不足。近些年来，以丁钢教授及其

领衔的学术共同体^①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史学者和其他一些教育史学者(周洪宇等, 2016; 刘海峰, 2016; 王雷, 2009)开始对图像、绘画、音乐、影像、建筑、身体和服饰等各种非文献史料进行开拓和创新性运用, 不断引导中国教育史学在史料的形态及其运用、研究问题和研究视域、解释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涉及教育史学整体研究范式的方面积极嬗变。

孔氏家族女性现存史料颇为丰富且形态多样, 不仅包括档案、文集、诗词、传略、日记、墓志铭等各种文献史料, 也包括服饰、生活器具、碑刻、绘画、书法、建筑和墓葬等方面的多种物质史料。为更好地利用现存史料, 充分揭示和呈现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的整体面貌, 研究者应积极借鉴国际历史学从倚重文献研究向重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以及国际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物质文化史领域的有益探索, 同时顺应国内中国教育史学研究范式嬗变、转型的整体态势。通过对文献史料、物质史料等多形态史料的综合运用, 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孔氏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教育和精神世界, 在一定程度上拓

① 长期以来, 丁钢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史学的前沿探索, 在研究问题、史料运用、解释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不断寻求中国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和转型。若从丰富和开拓史料形态的角度来看, 丁钢教授及其学术共同体近些年来分别对教育口述史(刘德恩, 2004; 司洪昌, 2006; 姜丽静, 2012; 易琴, 2010)、教育影像(毛毅静, 2012; 毛毅静等, 2013; 周勇, 2015)、教育音乐(胡乐野, 2011)、教育图像(丁钢, 2015; 丁钢, 2019; 张彦聪, 2012)、教育建筑和空间格局(丁钢, 2016; 丁钢, 2017; 张彦聪, 2016; Jiang, 2018)(其中初步触及女高师建筑格局及其性别规制、女学生服饰、身体、生活空间及起居用品等教育物质问题), 以及匠人学习生活(吴旻瑜, 2017)等进行了率先探索和积极尝试, 不断突破以往主流教育史学以文献史料为主体的研究理路。若从利用物质史料向物质文化史转型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 早在1992年前后, 丁钢教授在《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一书中即较早涉猎书院建筑与空间格局等问题, 其后, 对物质史料和教育文物的重视也一直是其教育史学关怀之一(2012年发表的《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图景》一文谈到文物的专史问题)。2018年1月和2019年11月, 由丁钢教授发起组织的两次学术论坛(第五届“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和第六届“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 汇聚了国内外一批从事教育物质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 从教育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出发, 对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当代转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创新性探索。

展中国教育史学的史料形态、解释空间和研究理路。

(三) 丰富学校教育生活化困境的解题理路

如何实现学校教育的生活化,进而增强学校教育的实效性,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发展的焦点和难题之一。这一问题的产生部分地导源于学校教育自身的“非形式化”特征及其自近代以来的不断正规化和制度化的努力。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就其长时段的主流形态而言,是一种迥异于现代学校教育的“非形式化”的“生活教育”。

概言之,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教育方式),是关于生活的教育(教育内容),也是为了生活的教育(教育目的)。因此,若借用今天的教育术语来观照,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或现代价值判断,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价值取向和教育目的上不无偏失,存在诸多与现代价值相悖离的方面,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也存在过于单一的不足,但是,若暂且抛开基于现代价值标准的评判不论,单就其内在运行机制及其赖以生成和维系的特定社会和文化生境来看,不能不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女子教育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它满足了特定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要求,并为社会和家族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了各式女性。因此,对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传统、模式特点、运行机制、功能得失及其赖以产生和维持的深层社会与文化动因等的深入发掘和探究,不仅有望为解决我国当代学校教育的生活化困境提供不同的思考理路,也有助于对其利弊得失做出更为审慎、客观的价值评判,并促进对当代教育模式及其困境产生背景的深度理解。

三、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别样取径

在综合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力求规避其不足的基础上，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研究需要形成别样的思路与路径。

(一) “五四”妇女史观的反思与再反思

1. 反思“五四”妇女史观

如前所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激进反传统进路”影响，形成了一种激进的“五四”妇女史观。尽管“五四”妇女史观并未揭示“全部”“客观”的历史事实，其影响却甚为深远，不仅构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妇女史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公众认知（陈东原，1928；杜芳琴，1988；Rosenlee，2006）。

这一观点流行到中国教育史研究之中便导致对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历史及其价值的简单否定，致使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和传统成为无须再耗时翻检的历史“陈迹”，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历史研究的正当性基础。目前，中国教育史学的主流写作，在古代教育史部分较少涉及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或女学的出现一般被视为有效区分中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中国古代似乎并无女学或女子教育，中国女学或女子教育的产生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到西方冲击后的舶来之物。

2017年，伴随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在中国当代文化转向的特殊语境中，系统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反传统进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传统进行审慎研究和重新评估逐渐成为趋势（新华社，2017；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8；王学典，2018；徐庆文，2017）。而通过对孔氏家族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考察，还原中国古代女性教育、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更

多面相，澄清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女性及其教育与生活状态的诸多误解，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努力方向。

2. 反思的再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经历两期发展之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物质文化史转向及其与考古学、科技史、艺术史和医学史等的广泛结合，国际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视野、解释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取得极大拓展，但是，就总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来看，仍基本沿袭了早期妇女史学者反思“五四”妇女史观、修改中国传统女性“受害”形象的一贯理路，目前尚未出现重大突破。就此而言，其与早期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从女诗人、女作家转向了女刺绣“高手”或女工艺“高手”；史料形态从以文献史料为主转向重视物质史料的运用。此外，在努力修改中国古代女性“受害”形象的同时，部分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主要表现为：第一，重视社会边缘或中低层女性的研究，对处于中国古代四民社会之首的“士绅大族”的女性关注不足或采取了有意回避策略；第二，重视女性个体和群体的妇女史研究，出于性别视角的考虑对男性群体和男性领域以及更为开阔的其他社会领域观照不足；第三，突出女性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及其对父权制或外在限制的突破，对女性个体所身处的家国脉络及其对女性发展的限制发掘不足。

鉴于此，在充分吸收国际中国妇女史研究两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要规避其不足，从对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再反思重新出发，就需要付出以下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从“边缘”重回“中心”，以孔氏家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存史相对丰富、地位最为尊崇的衍圣公妻女为主要个案，通过对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生活、教育和精神世界的还原和考察，反思其时占据主流的儒家妇德观念、体制和日常实践，借此对某些既定结论和其时所谓的“正统”“主流”儒家妇德观念进行反思和检省。二是在研究视野上，从单纯关注女性转向更为开阔的性别研究，研究视域应既包括女性，也包括

男性，并逐步扩展到其他更为开阔的社会领域。三是在研究思路，个人生活史与家族叙事相辅而行，展现个人与家族之间的复杂纠缠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与家族伦理的独特脉络。四是在史料运用上，注重文献史料与物质史料的综合运用，广泛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加强多形态史料的运用和解释力度。

（二）从“妇女”到“性别”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新妇女解放运动”在欧美社会的蓬勃发展，妇女史研究应运而生。早期的妇女史研究主要以“恢复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为妇女重建历史”为目标（Kelly, 1984）¹，其关注焦点在妇女自身，致力于让妇女从“隐匿于历史背后”变为“可见”（Rowbotham, 1974; Bridenthall et al., 1977）。1986 年，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J. W. Scott）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 5 期上发表文章《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不仅对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社会性别成为一个对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分析都非常重要的有效范畴，也促使妇女史研究走出单独关注妇女自身的局限，开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

1992 年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妇女、文化与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论文集的序言脚注中援引了斯科特的上述文章，并做出进一步阐释“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它们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晰表达及其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可以阐释清楚妇女的生活，但更为根本的是，它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运作进行探索。”通过发起和倡导“赋中国以社会性别”，与会学者强调“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并非仅仅占据中国学学术活动

的一个角落，而将改写人们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大多数基本范畴。”（Gilmartin et al., 1994）^{introduction}

斯科特所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推出了一系列经典成果（Ebrey, 1993; Ko, 1994; Mann, 1997; Bray, 1997; Hershatter, 1997）。此外，有关男性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相对来讲，国内情况更为突出），大多数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依然较多关注妇女自身，或至多扩展到男性对于妇女的态度，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对男性及相关领域以及其他更为开阔的社会领域所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事实上，斯科特在最初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时特别强调，在研究领域方面，应该把社会性别扩展到妇女研究以及与妇女相关的研究领域之外，特别是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例如政治、军事、外交和国家安全等主要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探究社会性别如果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同时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的基本形式，在这些领域如何产生效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研究男性所带来的弊端，“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此外，“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还“需要把视野打开，……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王政，2009）

基于上述认识，对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的考察，在研究视野上，力图实现从“妇女”向“性别”的转换，从过去单纯关注女性自身转向既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似乎不存在女性和性别问题的男性领域，如官场和学界等。此外，研究还将逐步涉猎两性以外其他更为开阔的社会领域。从表面看来，女性或性别问题似乎并未直接涉及这些领域，但社会性别理论正是要探究女性或性别如何潜在地参与和建构了这些特殊领域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以便

揭示其中隐匿的性别与权力之间的耦合与运作方式。事实上,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已有初步探索。张于坤的硕士学位论文《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探究》(2019)(姜丽静指导),主要以孔氏家族、毕沅和阮元等家族之间的联姻和学术互动为典型个案,集中探讨了孔氏家族与其他名门望族的联姻对孔氏家学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初步探究了其中的两种影响路径:其一,借助联姻和姻亲关系,几大家族的男性学者和文人在学术研究领域和文学创作中相携共进,不仅丰富了各自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内涵,而且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孔氏家学的发展;其二,嫁入孔氏家族的女性通过母教化育,将其家学传统与孔氏家学融会贯通,并在代际传承中成为助推孔氏家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该文还初步涉及了伙伴式婚姻对于男性学人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当然,由于史料等条件限制,该文主要对孔氏家族女性和联姻等显见的性别因素对于男性在学界和官场中的成长、发展和遭际等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究,而没有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与孔氏家族女性有关涉的男性及其所主导的领域和其他更为开阔的社会领域进行研究。

(三) 从“个体”到“家族”

1. 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史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以来(Ludtke, 1995),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流派,不仅放弃了传统史学的精英路线,将历史研究的主题从社会权力中心转向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大众,也对20世纪上半期占据主流的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进行了激烈批评。在它看来,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历史学“见物不见人”,在布罗代尔(F. Braudel)所建构的宏伟的历史学大厦中,忽略或丢失了历史的核心——“人”。因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捕捉历史中的人间的和个人的方面,赋予历史学“人间的面貌”(伊格尔斯, 2003)^{124, 134}。鉴于此,日常生活史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

那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并试图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复原那些沉默的普通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伊格尔斯，2003）¹³²⁻¹³⁴。

借鉴国际儒学界对儒学的通行定义（即将儒学视为一种在过去和现在依然支配着人们日常言行的价值信仰系统抑或精神传统）及对儒学层次和形态的三维划分（精英儒学、官方儒学和生活儒学或大众儒学），针对孔氏家族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个案研究，可以通过对其日常生活（个人的道德行为）、教育世界（教育或德育情况）、内在信仰（个人的道德信念）的复原和考察，反观其与精英儒学（德育思想）和官方儒学（德育体制）等所建构的外在且宏大的道德和性别秩序之间的复杂纠葛，并由此探析中国古代女子（道德）教育的真实状态、模式特点、运行机制、功能得失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对国内外主流儒学研究关注较少的儒学、性别与教育（德育）问题进行探讨，探究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或共生机制。

这一特殊研究问题的设定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使得个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而个人生活史也将是本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或观照视角之一。

2. 家族叙事：互系的个人

那么，如何对个人的日常生活或个人生活史进行呈现和解读呢？对此，许茨（A. Schütz）指出，普通人所经历的当下与被其称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的个人生活史密不可分，而这个当下“是一个人的所有以前经验的积淀，是通过他现有的知识储备所具有的习惯性所有物而得到组织的”（许茨，2011）¹⁰。若借用布尔迪厄（P. Bourdieu）的场域和惯习理论来看，如其所言，“正是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置身并形成于其中的场域本身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根源，把握他们的观点或（在一个场域中的）位置的根源”（布尔迪厄，2015）¹³⁴。可以说，对个人日常生活或个人生活史的描述和解读离不开对其所置身于其间的场域或生平情境的深入把握和理解。

事实上,当我们结合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特定社会结构进行思考时,不难发现,无论是许茨所提到的“生平情境”,还是布尔迪厄所强调的“场域”,都被赋予了特定意涵或者说更为明确的指称。借用罗思文(H. Rosemont, Jr.)和安乐哲(R. T. Ames)所发展的“儒家角色伦理学”的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个人”并非西方近代以来原子式的“个体”,而是中国儒家伦理观念中“互系”的“个人”(安乐哲,2017)。与西方自由主义视野中那个自由、独立和自治的“个体”不同,儒家视野中的“个人”是在家族伦理脉络中互相维系、牵绊的个人。每个人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扮演着多种伦理角色,他可能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兄长、下属或上司,而她可能是一个女儿、妻子、母亲或姐姐,等等。

正如罗思文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儒家认为,不可能有孤立存在的‘我’可做抽象概念考虑:我是我的所有角色的一个结合体;这些角色都是我生活着的与具体的别人的关系。这些角色交织着,于我们每个人,形成了一种特殊个人身份形态。”“在很大意义上,我自己的身份不是我个人实现的;……很大程度上,我自己是谁(who)以及我该怎样被认同(what),主要取决于他人,与我互动的他人,正如他们是谁、该怎样被认同,也部分地同时取决于我对他们的作为。”(Rosemont, 1991)⁹⁰⁻⁹¹

尽管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并且儒家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疏离和区隔,但是,在考察孔氏家族女性的个人日常生活行为、教育状况和内在信仰与外在宏大的儒家(德育)思想和官方儒学(德育体制)之间的真实关联时,运用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对于个人或人的解释和规定是恰当或适宜的。为了更好地复原和再现个人所置身于其间的特定场域或情境,深入剖析和解读经特定场域或情境熏染之后所形成的各种惯习或心灵积习,以个人生活史和家族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究,这意味着将把抽离的“个人”重新放置于她/他所身处的、充满牵绊的特定家族伦理关系之中。从各种伦理角色、人际关系

与交往的角度把握和定义个人。“做人……就是大家一起做角色之事与关系之事，否则就不是做人。”（安乐哲，2017）^{原序6}

（四）从“文献”到“物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历史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广泛借鉴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先后经历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新社会史”和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新文化史”（俞金尧，2013）¹⁵²，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超越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寻求历史学与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向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转向，即从过去主要倚重文献史料的分析转向重视物质史料的运用，并开始广泛吸纳考古学、科技史、艺术史、医药史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Busch et al., 1993; Bonnell et al., 1999; Kalb et al., 2005）。

因应西方历史学的物质文化史转向，国际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也于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呈现出向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的明显努力。例如，白馥兰对晚清时期中国民居建筑的性别格局进行了分析（Bray, 1997），高彦颐对女性缠足及相关服饰和制作技艺的探究，已经触及绣鞋、刺绣和裹脚布等物质史料（Ko, 2005），其对清初女琢砚家顾二娘制砚技艺的社会生活史考察，则表达了重视物质史料运用、向物质文化史转向的明确诉求（Ko, 2017）。另如，滕斯托尔（A. Tunstall）对女性织锦技艺的研究（Tunstall, 2012），有学者对晚明顾绣代表人物韩孟溪的探讨（Huang, 2012），有学者对佛教女信徒绘画、刺绣和珠宝首饰等“女性物件”（women's things）的研究（Li, 2020），以及魏嘉丽（L. Blanchard）对宋代绘画和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分析（Blanchard, 2018），等等。这些均表现出顺应物质文化史转向，广泛借鉴艺术史、科技史、考古学和医药史等多领域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妇女与性别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积极探索，并且反映了史料运用、研究问题、研究视域、解释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诸多

变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际历史学还是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向物质文化史的转向，其对物质史料的重视和利用，并非意味着对文献史料的简单否定和弃之不用，恰恰相反，物质文化史转向的最初动因之一就在于在某些研究问题或研究对象上文献史料缺乏，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物质遗存/物质史料的运用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Gerritsen et al., 2015）。并且，即使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日渐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充分利用和解读，依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步骤和方法（Harvey, 2009）¹⁵。当然，西方历史学的物质文化史转向，并非仅仅意味着史料形态的变化——从过去倚重文献史料转向重视物质史料，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物质史料被推向了史学研究的中心，成为历史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而研究的问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旨在通过研究物质，重新发掘人与物质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中隐含的特定权力结构抑或社会和文化意义。

前已述及，孔氏家族女性的史料遗存丰富，史料形态多样，不仅涉及档案、诗词、文集、日记、传略和地方志等各种文献史料，还广泛涉及服饰、生活器具、绘画、书法、建筑、碑刻和墓葬等多方面多形态的物质史料。研究可以顺应国际历史学和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物质文化史转向，积极探索相关物质史料的利用和研究，同时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中国妇女史研究一期发展中对诗词、传记、日记、戏曲和墓志铭等非官方文献史料运用的有益经验，在综合运用相关物质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孔氏家族女性的生活、教育和精神世界的整体面貌。当然，由于孔氏家族女性研究所涉及的文献史料和物质史料等多形态史料具有跨学科性质，客观上要求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通力合作、协同攻关。如此，相关研究方有望完成。

四、结 语

如前所述,从“妇女”到“性别”的研究转向,是源自社会性别概念和性别理论框架的提出,其本身即是对单纯关注妇女研究的扬弃,却又将妇女研究包括其中。因此,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选择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要体现一种“强调”和整合。因为,我们更主张的是一种整合的视域和态度,即在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基础上规避其不足,对其进行“再反思”;在家族、互系的伦理脉络中观照个体,在引入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史料,在更为开阔的性别视野中开展女性研究,其意义必将溢出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 安乐哲,2017. 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 [M]. 孟巍隆,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白馥兰,2006.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 [M]. 江湄,邓京力,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布尔迪厄,2015. 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曹兴民,2009. 盘根错节的古树:阙里孔氏家族文化与孔府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 陈东原,1937. 中国妇女生活史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 陈来,2013a. 学术儒学、文化儒学、民间儒学:当前新儒学的存在方式 [N]. 北京日报,2013-06-14 (20).
- 陈来,2013b. 新儒家之后:儒学何为 [N]. 人民日报,2013-12-22 (5).
- 陈来,李存山,张再林,2018. “情感儒学”评析:蒙培元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 [J]. 东岳论丛 (6): 5-19, 191.
- 成中英,2017. 成中英文集:第四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丁钢,2015. 村童与塾师:一种风俗画的教育诠释 [J]. 社会科学战线 (2): 199-202.

242-248.

丁钢, 2016. 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 [J]. 探索与争鸣 (2): 94-99.

丁钢, 2017. 转向屏风: 空间、图像及其叙事中的教化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4): 1-5.

丁钢, 2019. 技能与德行: 社会生活中性别角色的图像隐喻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5): 4-8, 20.

董倩倩, 2010. 清代孔氏家族女性诗人诗作综考 [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杜芳琴, 1988. 女性观念的衍变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杜芳琴, 王向贤, 2003.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 1987—2003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杜家骥, 1992. 乾隆之女嫁孔府及相关问题之考辨 [J]. 历史档案 (3): 98-101.

杜维明, 2014.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高彦颐, 2005.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M]. 李志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齐勇, 1994. 儒学的生命在民间 [J]. 中华文化论坛 (4): 5.

何光顺, 2019.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 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J]. 哲学研究 (9): 45-55, 127.

贺萧, 2003. 危险的愉悦: 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M]. 韩敏中, 盛宁,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贺萧, 王政, 2008. 中国历史: 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 [J]. 社会科学 (12): 141-154, 186.

胡乐野, 2011. 独立的声音: 80 后的教育生活与音乐想象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黄怀信, 等, 2011. 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黄玉顺, 2006. 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姜丽静, 2012. 历史的背影: 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姜修宪, 成积春, 孔德平, 2015. 60 年来孔府档案研究述评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3): 103-108.

蒋庆, 1991.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J]. 深

- 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0-91.
- 蒋庆，2015.“大陆新儒家”正在形成中[J].原道（2）：223-243.
- 孔德平，唐丽，2017.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5-20.
- 孔祥林，2015.曲阜孔氏家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孔祥林，管蕾，房伟，2013.孔府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 孔勇，2017.“夫人”何以成“公主”？“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新辨[J].清史研究（4）：121-131.
-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编纂委员会，2018.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1988.孔府档案史料选[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
- 李观安，郑广玲，1974.从孔府办的“四氏学”看“有教无类”的虚伪性和反动性[J].文史哲（1）：19-23.
- 李先明，2019.孔庙“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1928—1932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J].近代史研究（2）：81-94，161.
- 李小江，等，2002.历史、史学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学勤，1987.竹简《论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2）：60-64.
- 李泽厚，2008.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德恩，2004.职员阶层的兴起：民国时期上海职员的生活与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刘海峰，2016.科举制的遗产与申遗问题[J].教育与考试（4）：5-10，20.
- 刘腾，贾凤姣，2011.浅论衍圣公对四氏学堂的影响[J].文学界（理论版）（3）：128.
- 鲁迅，1983.鲁迅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罗晓翔，曼素恩，2015.清代知识女性的“写作文化”[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06-21.
- 骆承烈，1986.也谈“乾隆公主嫁孔府”说[J].齐鲁学刊（2）：76-77.
- 骆承烈，朱福平，骆明，2002.孔府档案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曼素恩，2005.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定宜庄，颜宜蓓，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毛伟，2014.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情况概述[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6）：49-50.
-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毛毅静, 2012. 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 1910—2010 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毛毅静, 丁钢, 2013. 别样的历史叙事: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教育影像 [J]. 教育研究 (1): 10-15, 43.

蒙培元, 2009. 情感与理性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孟娥, 孟华, 2001. “孔孟颜曾四氏一家”源流考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6): 77-79.

孟继新, 1990. 天下第一家 [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曲阜县文管会, 1980.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M]. 济南: 齐鲁书社.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2018. 近两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 2015—2017 [C] // 王学典.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施婧娴, 2013. 孔广森《春秋》学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

石玲, 2013. 清代曲阜孔氏圣裔女诗人论略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3): 45-52, 1.

司洪昌, 2006. 嵌入村庄的学校: 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宋思伟, 刘振佳, 2007. 衍圣公府与曲阜师范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汪维真, 2012. 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 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 [J].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1): 64-90.

王雷, 2009. 中国教育文物: 内涵、分类与收藏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7): 24-29.

王学典, 2018.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 [C].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政, 1997.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47-51.

王政, 2009.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的发展 [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5): 1-7.

吴旻瑜, 2017. 安身立命: 中国近世以来营造匠人的学习生活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吴佩林, 林家伟, 2019. 近六十年来明清时期孔府土地问题研究述评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5): 44-51.

吴锡标, 刘小成, 2014. 孔氏南宗江西诸支派交游考略 [J]. 探索与争鸣 (12):

94-97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吴锡标, 刘小成, 张慧霞, 2010. 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谢晓东, 2010. “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J]. 哲学动态 (10): 63-67.
- 谢雨濛, 成积春, 2019. 曲阜孔氏族长的选任方式与原则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9): 18-20.
- 新华社, 20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6): 18-23.
- 徐庆文, 2017.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概览 [J]. 文史哲 (6): 2, 169-170.
- 徐天啸, 1913. 神州女子新史 [M]. 上海: 神州图书局.
- 许茨, 2011. 社会实在问题 [M]. 霍桂桓,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颜炳罡, 2006. 民间儒学何以可能? [C] // 国际儒学联合会. 国际儒学研究: 第14辑: 2005年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专集.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姚金笛, 2015. 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伊格尔斯, 2003.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M]. 何兆武,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伊沛霞, 2004. 内闾: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M]. 胡志宏,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易琴, 2010. 知识传授与学术探究: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图景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余志群, 1985. 否“乾隆公主嫁孔府”说 [J]. 齐鲁学刊 (5): 98-99.
- 俞金尧, 2013. “新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评周兵著《新文化史: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J]. 史学理论研究 (3): 150-153.
- 袁兆春, 2013. 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言昌, 孟瑞华, 张凤, 2011. 孔氏家族教育研究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张彦聪, 2012. 村童闹学图: 一个扑朔迷离的场景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张彦聪, 2016. 君师权力的崛起: 朱元璋与明初太学空间重构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张于坤, 2019. 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探究 [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 赵荣光, 2007. 《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赵汝愚, 1999. 宋朝诸臣奏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赵文坦, 2012. 孔氏南宗“让爵”考 [J]. 史学月刊 (3): 46-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

1982. 孔府档案选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 周洪宇, 赵国权, 2016. 文庙学: 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 [J]. 江汉论坛 (5): 94-103.
- 周勇, 2015. 杨德昌电影中的都市教育实验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 168-180.
- BLANCHARD L, 2018. Song dynasty figures of longing and desire: gender and interiority in Chinese painting and poetry [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 BONNELL V E, HUNT L, 1999. Beyond the culture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Y F, 1997.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IDENTHAL R, KOONZ C, 1977.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BUSCH J C, LUBAR S, KINGERY W D, 1993.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M].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EBREY P B, 1993.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RRITSEN A, RIELLO G, 2015. Writing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GILMARTIN C, HERSHATTER G, ROFEL L, 1994.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K, 2009.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a student's guide to approaching alternative sources [M]. New York: Routledge.
- HERSHATTER G B,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ANG I-F, 2012. Gende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Gu family embroidery in late Ming Shanghai [C] //ELVIN M.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Tübingen: Hans Ulrich Vogel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 JIANG L, 2018. Educational memory of Chinese female intellectual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Singapore: Springer.
- KALB D., TAK H. 2005. Critical junctions: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beyond the

- cultural turn [M].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KELLY J , 1984.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O D ,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 D ,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 D , 2017.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I Y , 2012. Embroidering Guanyin: construction of the divine through hair [C] // ELVIN M. East Asian 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medicine. Tübingen: Hans Ulrich Vogel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 LI Y , 2020. Becoming Guanyin: artistic devotion of buddhist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UDTKE A , 1995.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M].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N S , 1997.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MONT H , Jr , 1991. 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 and role-bearing persons [C] //BOCKOVER M I. Rules , rituals ,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Herbert Fingarette. La 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ROSENLEE L L , 2006. Confucianism and wome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WBOTHAM S , 1974. Hidden from history: rediscovering women in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ROZMAN G , 1991.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M].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NSTALL A , 2012. Beyond categorization: Zhu Kerou's tapestry painting butterfly and camellia [C] //ELVIN M. East Asian 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medicine. Tübingen: Hans Ulrich Vogel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